相信习近平 相信中国

——《习近平复兴中国》连载

□〔美〕罗斯·特里尔 主编

新中国成立100年会是什么样子？

虽然预测未来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但中国领导人早已将战略目标锁定到了这一年。

习近平多次公开宣示：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执政党对全体中国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也是不可更改的“军令状”。

这就意味着，中国要重返世界之巅，回到这个民族应该达到的高度。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中国必须“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届时的中国不仅要在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方面上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政治、文化、国际影响力等软实力方面也必须跻身世界一流。中国的崛起将不允许有明显的短板，而是全方位的复兴。

中国的复兴，不是为了当一个自给自足的“超级富翁”，而是立足于中国人传承已久的兼济天下的使命与情怀。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在为纪念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诞辰90周年撰写的文章中说：1911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45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45年，就是2001年，也就是进到21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6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是毛泽东的复兴梦，也是习近平的复兴梦。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讲到：毛泽东同志说过：“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实现我们确立的奋斗目标，我们既要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又要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进取精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进！

中国的复兴路上关山万重，不可能一帆风顺，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复兴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难题。但中国复兴最大的风险还是来自于中国人自身，特别是失去了梦想的能力。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中，梦想对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几乎是一个贬义词，梦想家几乎等同于空想家。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高级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在其著作《大国雄心——一个永不褪色的大国梦》一书的序文中，高度评价习近平的一个重大历史贡献就是重新唤起了中国人民的梦想能力，让整个民族都找到了未来感——“目前，已经有7亿中国民众摆脱了贫困，尽管其生活水平仍只是一般，但相比于以前已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过去的中国相对贫困，现在则日渐富强。此前的中国生活在历史的阴影当中，现在的中国却越发自信、乐观。因此，中国能够做得起梦。”“面向未来也成为习近平时代的特征之一。”“不止于此，中国还需要有梦想，因为其必须要设想并构建出一个全新的未来。”

马丁·雅克等认为，习近平不但重新唤醒了中国人的梦想能力，而且让中国人的未来形态也变得更加清晰了——“中国梦”鼓励每一个民众不仅要敢于构想国家的未来，同样也可以构想自己的未来。实际上，中国的年轻人已经明显展示出乐观主义精神和对未来的憧憬，开始为自己的梦想奋斗。“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中国民众将经历一场全方位的巨大变革，将展现出与现在截然不同的特征：更加富有、健康，更为国际化、富有全球视野，更能体会他者的感受，更加自信，教育程度更高，思维更加开阔，更为重视环保。”

莎士比亚有句名言：凡是过去，皆为序曲。如果平心静气地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在过去的20个世纪中，有接近17个世纪的时间位居世界最富足大国的位置。布热津斯基说过，“中国在农业生产力、工业创新和生活水平方面领先于全世界”。换句话说，中国位居世界一号的主角地位，在历史上更像是常态，而屈居配角更像是非常态。21世纪中国复兴，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认为是让中国恢复应有的常态。

当然，相比过去中国文明内部的自我盛衰循环，中国新一轮崛起将依托于全球化，也服务于全球化。

如果站在全球化的大格局中看待中国的复兴，将会发现未来中国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处于世界舞台中心位置。在过去的零和博弈时代，中国的地缘格局在世界大国中最为不利，不论陆地还是海洋都面临着强敌环伺，全世界强大的对手国家似乎都被摆到了中国的周边，“中央大国”更像是“四战之地”。但如果世界进入全球化的多赢时代，中国所处的格局就截然不同了——中国与未来世界最有潜力的经济体都具有区位合作优势，通过“一带一路”，中国在陆地上可以与印度、俄罗斯、韩国、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伊朗等国以及欧盟直接沟通，在海洋上与美国、日本、加拿大、印尼、澳大利亚等比邻而居。同时拥有海陆两栖优势的中国，在G20中最适合担当中央枢纽，全球的经济地理中心非中国莫属。

可以说，正是全球化赋予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崛起的机会。没有全球范围的托举，中国无法成为世界级大国。同理，缺乏全球视野，中国人也无法对世界作出更大贡献。所以，习近平鲜明指出“中国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正是着眼于中国复兴的内在需要。

全球化将托举起中央大国的荣耀，但中国对全世界的回报也将是丰盛的。到2050年时，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繁荣和科技创新的主发动机，中国也将成为世界和平秩序的最重要守护力量。而其中意义最重大的，莫过于中国将为全世界奉献一条和谐共赢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在于：它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探索，为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新模式，即像中国这样积贫积弱的世界人口第一大国都有机会通过自我变革崛起，这充分证明不走掠夺与侵略的老路是完全可行的。天道酬勤，自助者天助之，和谐共生符合历史的意志，发掘人性的善比放大人性的恶，更能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车轮。

曾经长期考察中国的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其著作《中国问题》一书中坦言：将中国改造为现代国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外国人应该静待中国人自行解决。只有中国人才最了解中国，我们并不了解。如果任其自由发展，最终必然会有一种适合于他们性格的解决办法，我们不应该越俎代庖。只有他们自己慢慢摸索出的解决办法才是长久之计，而外部势力在时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强加给他们的必然是不自然的，因而也不会是长久的。

已故的美国汉学家、政治学家白鲁恂曾经指出“中国是裹着民族国家外衣的文明体”。鉴于中国文明的独特性，白鲁恂等坚定认为，未来中国即使强大起来，也会与西方诸大国的表现截然不同。

中国发展道路根植于中国的文明传统，中国道路方法论的核心就是只有坚持走自己的路，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不顾文明基因的差异，一味地克隆或者复制他国模式，必然引发强烈的副作用。中国不向外输出革命，不诱迫他国模仿中国经验，更不会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是中国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则。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全球通史》一书中指出，科学技术的这种高速发展首次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能否柔顺到足以适应一种他们正在如此迅速地改变并在许多情况下予以污染的环境。人类能改变自己传统的习惯和制度以妥善处理作为科学技术有害的副产品而源源不断地产生的大量难以对付的问题吗？

在急速发展的科技力量面前，人性的进化是如此的缓慢。如何处理科技以及现代化给人类带来的巨大挑战？中国作为古老文明大国，具有不可替代的丰富经验。

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教授杜维明等指出，中国有责任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还要“把人生的意义价值探讨出来”。

在当下详细描绘30多年后中国的文化样貌形态，显然非常困难。但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中可以看出，近3000年来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波动并不大，中国文化的内省能力和适用能力，可以让中国在极为剧烈的社会变迁面前，也能保持岿然不动。

这里不妨以《论语》中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文为例。这篇文章通过记述公元前5世纪时孔子和四个弟子的一次谈话，反映了几种治国思想的差异。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人治国思路虽侧重点不同，但都符合先富后教、富国强兵的路子，孔子也都表示赞成。但曾皙却提出了一个治国理政更高的境界，即通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带来社会的康乐和谐、安定祥和，人人充满活力又揖让自律，让个人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中找到生命的价值。所以，曾皙得到了孔子的最高赞许。

可以想见，未来的中国人仍然会坚守这样的心灵自由境界。“仁者爱人”“功崇惟志，业广惟勤”“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与天地精神独往来”“在山水田园间诗意地栖居”，等等。即使再过几个世纪，这些也将仍然是中国人的生命价值追求。

中国人的世界观表现在生活方式上，是追求立德树人，天人合一，在恬淡自然中求得安身立命之所；表现在处理对外关系上，是重视怀柔亲诚，“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中国即使强大起来，也不会以大欺小、倚强凌弱，中国将更像是一位忠厚的长者，以信义著于四海，以大度包容的态度对待偏见和傲慢，竭诚联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减少全球的纷争与困扰。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任时曾指出，“美国将成为人类最后唯一的帝国”。他的预言现在看来至少说对了一半——美国的确是人类社会最后能享受霸权的“帝国”，当今的世界也没有合适的“帝国候选者”。因为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放弃了“霸权思维”，中国不愿意甚至憎恶成为帝国权力的“竞争者”，人类社会也不会再出现一个大权独揽的铁腕国家担任地球的守夜人。但美国不一定是人类最后一任最强盛国家，因为中国人早有古训“敬天命无常，惟有德者居之”。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间的大德容不下私利长久存在的空间。未来的人类必然会选择最正直最无私的国家作为自己的表率，而对天道与人性都有着最真切体会的中国人，无疑是其中最有竞争力的。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参加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典时饱含深情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在复兴路上，中国注定能够冲破一切艰难与风险的最大资本，也正是来自于拥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强烈天下意志的中国人民。对此，习近平深有感慨地指出：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

“胜利不会向我走来，我必须自己走向胜利。”这是美国当代女诗人玛丽安娜·摩尔的诗作，也是习近平最喜欢引用的诗句之一。在引领中国走向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习近平正在用一个接一个的胜利证明，梦想的实现正在离中国人民越来越近。中国复兴的最终成功，将充分证明习近平复兴战略的伟大意义。

以鲜明的党性品质增强组织生活的生机活力

熊照元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指出：“党的组织生活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和载体，是党组织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的重要形式。必须坚持党的组织生活各项制度，创新方式方法，增强党的组织生活活力。”过好党的组织生活是党员最经常、最基础的党内生活方式，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党性锻炼途径。强调增强组织生活活力，揭示了严格党内组织生活对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基础性作用，抓住了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最为经常的手段载体。落实这一要求，必须增强组织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着力提高组织生活质量和效果，以其鲜明的党性品质激发组织生活的活力之源。

用好“三会一课”这个平台，着力发掘组织生活的党性修养功能

定期召开支部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党小组会和按时上好党课，是党组织生活最核心、最本质的部分。前些年一些党组织将组织生活庸俗化、形式化、随意化甚至娱乐化，使之失去应有的党性特色，失去了庄重性、严肃性、政治性。增强组织生活活力必须扭住落实“三会一课”制度这个重要抓手，牢牢把握党性修养这个核心之点，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首要任务，以严明政治纪律、严守政治规矩为重要内容，着力强化组织生活党性锻炼和修养的功能作用，不断提高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一是强化思想淬火的“大熔炉”功能。这是党内政治生活最基本的功能。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面临“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的严峻挑战，党员队伍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些年轻党员、干部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学习、缺乏对党的优良传统的深入了解、缺乏艰苦环境和复杂斗争锻炼。必须把思想教育和理论武装作为组织生活的首要任务，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党章党规以及《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下称《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下称《条例》），引导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和道德修养，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切实解决好如何做人、为什么入党、为谁当官这个根本问题，做到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始终不忘初心、不忘本色、不忘规矩。

二是强化组织凝聚的“集结号”功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通过组织把党员集合起来，把集结号吹起来。不是党员的，明白集结号里没有他，就会见贤思齐，努力争取入党。”这个“集结号”，就是党组织生活所具有的激励和引导作用。《准则》明确提出，每个党员无论职务高低，都要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激励，就是通过健康的组织生活，使党员的意见上达组织，使组织的意志下达党员，形成上下同欲、戮力同心的生动局面。引导，就是通过经常的组织生活，使上级得到下级的有效监督，下级得到上级的有力指导，形成以上率下、上下联动的生动局面。通过经常性的组织集结，强化全体党员的“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

三是强化党性提纯的“净化器”功能。党性修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大量情况表明，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并不会随着党龄的增长而必然增长，其道德修养、思想境界也不会因职务的升迁而自然升迁。《准则》明确提出，党组织要严格执行组织生活制度，确保党的组织生活经常、认真、严肃。党组织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管理监督，绝不允许有任何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接受党内和群众监督的特殊党员。通过严格的组织生活，使每一个党员、干部置身组织管理监督之中，不断地扫除脸上的灰尘、涤除思想的沉渣，始终保持先进性境界和纯洁性品质。

四是强化净化生态的“防护网”功能。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联系起来、摆上突出位置抓，是习近平总书记管党治党的重要思想。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胡作非为，大搞政治阴谋活动，把党内政治生活搞乱了，把党内政治生态搞坏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大力整治“四风”，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坚决惩治腐败分子，党内政治生活出现新气象，党内正气在上升，党风在好转，社会风气在上扬。然而，风气的恢复非朝夕之功，生态的修复也需付出巨大艰辛。必须从严格党内政治生活入手，通过经常的组织生活，不断地进行思想“清霾”、组织“除渣”、作风“净化”。只有这样，才能厚实优良传统的土壤，积淀党内政治文化，真正把山清水秀的党内政治生态恢复起来、保持下去。

用好党性分析检查这面镜子，始终坚守组织生活的政治品质

刘少奇指出：“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突出党性分析，是组织生活的应有之义，也是增强组织生活活力的有效方法。注重从党性上深摆问题、深查危害、深挖根源，是这些年开展党性教育活动和党内组织生活的有益经验。增强组织生活活力，必须把党性分析贯穿“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谈心谈话、党员民主评议等各项组织生活全过程，使党员、干部真正得到严格的党性锻炼和灵魂洗礼。

对照理论理想提升党性分析的先进性品质。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一些领导干部走上违纪违法的不归路，都是从放松理论学习、淡化理想信念开始的。《准则》明确提出，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指出思想理论上的坚定清醒是政治上坚定的前提。党性分析必须牢牢把握党内生活的党性特质和政治品质，把加强思想建设摆在首位，从灵魂深处把理论武装的根基夯实，将理想信念的底基筑牢。要经常问一问：在理论学习上是不是真学深悟、真信真用，在信仰问题上有没有心存怀疑、迷茫动摇，在政治原则问题上是不是态度暧昧、躲闪逃避，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不敢亮明态度、举旗亮剑，在政治敏感问题上能不能做到站稳立场、把准方向。要把这些重大政治问题搞得很清楚，使理想信念这个“压舱石”稳如泰山，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头”紧如钢铸，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对照党章党规卡紧党性分析的刚性化尺度。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立起了共产党人的“标准像”。要经常对照党章，看一看差距、想一想不足、查一查问题，不断强化党员意识、宗旨意识、先锋意识、责任意识，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始终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与党同心同德。《准则》是党内生活的基本规范。每个党员、干部要自觉用《准则》对照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一条一条抓落实，一项一项查不足，切实做到知所为、知所进、知所止，使自己的一言一行合规中矩。《条例》是规范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行为的硬约束，要把自己摆进去，敢于给自己动手术，向体内病灶开刀，使之成为永葆肌体健康的生命之源。总之，党性分析要把自律意识、规矩意识、先锋意识突出出来，用纪律和规矩的刚性，保证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向前进。

对照民心民声丰富党性分析的实质性内容。历史地看，我们党领导革命能够以“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领导建设在军事上能够“打十分”、在政治上也能“打满分”，领导改革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领导反腐斗争在短时期内能够取得压倒性胜利、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根本原因就是党始终植根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讲党性，最根本的是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时刻牢记根本宗旨，从人民群众的呼声中倾听需求，从人民群众的批评中反思不足，从人民群众的赞扬中体味期待，在全面、及时了解民心民声中，不断丰富党性修养的鲜活内涵，厚结联系群众的坚实纽带。

对照先烈先进立起党性分析的具象化标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执政以后给党员干部带来的变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党内贪图安逸享受、不愿艰苦奋斗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想利用执政党的地位和威信谋求个人私利的人逐渐多了起来，高高在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人逐渐多了起来。”这是党执政后面临的最为现实的考验，也是跳出“历史周期律”必须解决的问题。领导干部的好榜样焦裕禄离开人民50多年了，为什么至今还有那么多人怀念他？焦裕禄这个典型已经过去50多年了，为什么至今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就在于焦裕禄毕其一生始终不忘初心、不忘宗旨、不忘责任，殚精竭虑地为党和人民而拼搏奋斗。党员干部要像革命先烈和先进典型那样，始终铭记初心，按党提出的标准要求自己、磨炼自己、提高自己，职位越高，越要夙兴夜寐地工作，越要毫无私心地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党和人民，越要按规则正确用权、谨慎用权、干净用权，越要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名节和操守。

用好监督执纪问责这把戒尺，始终强化组织生活的硬性约束效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在不少方面虽然有了“起势”但还没有形成“定势”，虽然取得“优势”但还没有达到“胜势”。党的组织生活要适应这个大形势，党组织要监督党员切实履行义务，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党员要积极行使党员权利，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民主监督，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强化党内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的强制规范力和刚性约束力。

（下转4版）